

王 湘 著



教 学 偶 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教学偶得

王 湘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教学偶得

王 湘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绍兴地区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5 字数73,000

1981年5月第 1 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7103·1164

定 价: 0.26 元

目 次

从郭聚驼种树写起.....	(1)
爱学生.....	(4)
三谈育才.....	(7)
说“严”三章.....	(12)
“细”教.....	(15)
古人治水的联想.....	(18)
三改评语.....	(20)
好雨知时节.....	(22)
谈话节录.....	(25)
让孩子心头燃起明灯.....	(28)
爱护创造的种子.....	(29)
兴趣——学习的动力.....	(31)
良药何必苦口.....	(35)
“妙方”全在人用.....	(37)
帮助家长懂得教育法.....	(39)
备课随笔.....	(42)
进课堂的艺术.....	(51)
要教出味来.....	(52)

宜“带”不宜“背”	(55)
启发多想	(57)
“须教有疑”	(60)
鼓励多问	(64)
引导多议	(66)
多让学生动手	(69)
把课教“活”	(71)
给以“指头”	(74)
课堂提问点滴	(78)
不忘“吃饭原理”	(84)
谈“多练”	(86)
“亡羊补牢”一释	(88)
讲究课堂语言	(90)
板书的学问	(92)
由“听不懂”想起的	(94)
打好塔基	(96)
取经	(98)
装满“一桶水”	(100)
要有硬功夫	(103)
无声的教育	(105)
并未完结	(107)

从郭橐驼种树写起

文章为何从这里写起？此篇又何以列为卷首？

这在作家写作来说，原是挺讲究的。大文豪高尔基甚至主张开头第一句话就要定下整个作品的基调。我不是作家，当然远没这样高的本领。我所以要从这里落笔开篇，则是受惠于唐代名家柳宗元那篇《种树郭橐驼传》的启迪。

柳宗元在文中谈到，当时许多人都有种好树的愿望，有的甚至成天绕着树转，“爱之若子”，结果呢，却是“害其长”、“抑其实”；唯独郭橐驼与众不同，他种的树是“硕茂蚤实以蕃”，不仅生长得高大茂盛，而且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大家同样都想种好树，为什么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呢？原因就在于人们还不懂得怎么种树，而郭橐驼则已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种树经验。这套种树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就是能顺应树木生长的天性而使它成长。柳氏作文是以“种树之道”说明“养人之术”。我读柳文则想到了教育工作，以为郭橐驼的种树经验实在是一条至关重要的“育人之理”。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天性”不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么？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大至宏观世界，小至基本粒子，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律。经济有法则，艺术有门道，教育这种社会现象何尝没有它的客观规律呢？

就一个人的生理、心理来看，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各个时期的发展自有它的规律。

按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发展学生智力而言，教师有教的规律，学生有学的规律。

从雕塑灵魂的角度来看，要使各类学生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情操需要哪些条件，得采用怎样的方法，要经历多少阶段，等等，都有它的规律。

试问：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是否都已掌握了这些规律，都能顺应这些规律从事教育了呢？

毋庸讳言，并不尽然。不妨略举几例。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本应该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和思想基础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教育，特别要强调寓德育于智育之中，使二者水乳交融。但是，不少学校并不这样。一提德育，就是大会报告，小组讨论，而且不分年龄大小、年级高低，一刀切，一锅煮。课堂教学中，不是贴个政治教育的标签，就是拖个思想教育的尾巴，把德育与智育搞成油水分离。对于思想问题，不是东风化雨润心田，而是雷霆暴雨吓唬人；不允许认识事物有先后，而采取“强压服”、“限期通”，甚而至于体罚也尚有之。

提起纪律教育，有的教师不看儿童的特点是爱玩、好动、喜欢新奇事物，一看到学生课桌上的玩具或有趣的东西，就抬脚动手，不是夺而摔之，就是没收了之。殊不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会变成木鸡似的“小老头儿”的。

说到提高教学质量，重知识轻发展是普遍现象。没有重视把教学真正变成“发展性教学”，没有注重开发智力，让学生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展。个别学校领导喜欢下行政“命令”，片面地追求升学率，订高分指标，搞“题海战术”和“课内不够课外补”的“疲劳战术”，甚至公然要师

生表决心，发誓言：“宁掉几斤肉……”

这些都说明，我们的不少教育工作者，从学校领导到一般教师，虽有教育学生的良好愿望，却无教育学生的良好方法，还不能顺应教育规律办教育，还没有成为教育的行家。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与“树人”有其共同的道理：必须顺应其成长的规律。然而，“树人”毕竟比“树木”更为不易。斯大林因此谆谆告诫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培养人，就象园丁栽培爱护果木一样。”（《列宁斯大林论劳动》）唯其如此，所以，夸美纽斯认为，在太阳底下没有别的职业象教师的职业那样对人类如此之重要了。教育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教师。他要求教师成为本行的能手，十全十美地掌握教学艺术。只有象郭橐驼掌握种树规律那样切实地掌握起教育规律，顺应教育规律办教育，才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使未来国家栋梁之材欣欣向荣。这便是我撰写此文，且把它列为卷首的缘由。

爱 学 生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的基础。

“尊师爱生”这个口号就是提倡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不仅要学生尊敬教师，而且要教师热爱学生。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爱是理解的别名。”对任何事物只有首先爱它，才会以拳拳之心去关心它。心理学研究表明：教师是否关心爱护学生，是否对学生寄予希望，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进步。这是由于教育活动并不只是教师影响学生，而是师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当教师以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对学生发生作用和影响时，学生也以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对教师作出反应。譬如，教师关心爱护这个学生，并对这个学生寄予希望，那末，这个学生就愿意接近教师，乐意接受教师的教育，进步就快；反之，教师不关心爱护这个学生，并对这个学生不寄予多大希望，那末，这个学生就会与教师的关系日渐疏远甚至对立，进步就不快。由此可见，教师对学生的热爱是何等重要啊！

爱学生，就是用火热般的热情去感动学生，与学生建立感情。这是人民教师的美德。有了这种爱，教育学生时，其言必亲切，其语必感人，也必定能使学生深深感到老师的真诚帮助，定能打开他们的心扉，接受革命道理和科学知识的雨露。

爱学生，就是要时时处处关心他们，从课内到课外，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都要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全心全意地

为他们服务。当年徐特立先生在长沙师范工作时，每天晚上都要提着马灯亲自去巡视学生寝室，督促学生按时就寝。一夜没去巡视，他就睡不着觉。一次查看寝室时发现有个学生脚上生疮正疼得难受，他就亲手舀水帮学生洗脚敷药。要知道，徐先生当时已是一校之长。校长尚且如此不辞辛劳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学生，热心为学生服务，教师就更是义不容辞了。教师对待有关学生健康成长的每件工作，都要象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大卫·科波菲尔》

“离间”一章中所说的：“在大事上和小事上，我总是一直地认真。……凡可以献上我全身的事，决不献上一只手。”

（《大卫·科波菲尔》第7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

爱学生，应当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放学路上，碰到村狗在狂吠，小学生害怕得躲到老师的身后不敢作声，怎么办？是教师上前把狗赶跑，领他们平平安安地过去，还是壮学生的胆，撑学生的腰，鼓励学生捡起石块，抡起棍棒，自己动手把狗赶跑呢？劳动课里，女学生一看见菜叶上有毛虫就吓得惊叫起来，慌忙逃开了，怎么办？是教师上前把虫除了，让她们在干干净净的地方干，还是说清毛虫的危害，教以除虫的方法，督促她们自己动手把虫除掉呢？诸如此种场合，教师的卫护是不利于培养孩子坚强勇敢的性格的。正确的方法，应当是鼓励他们勇气百倍地去战胜形形色色的“村狗”、“毛虫”，战胜大大小小的困难。这样，长大以后在紧要关头，他们才能挺身而出，舍己为人。早在唐代柳宗元笔下的种树专家郭橐驼就认为，对树木“爱之太恩，忧之太勤”的做法，“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由树及人，不是同一道理么？

爱学生应当爱得全面。对全体学生都要爱，对全体学生都要严格要求。

生理上有缺陷的人也要爱护；不仅要爱品学兼优的学生，还要爱品学皆劣的学生。越是品学皆劣的学生，往往越不被人所爱；越是不被人所爱的学生，教师越应当爱他们。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社会，他们都是不受人欢迎的人。各方面的冷遇，使他们既自卑，自己瞧不起自己，又自尊，不允许别人在人格上蔑视他们。你越厌弃他们，他们就越反感，越会走向极端。实践证明，一个心灵上伤痕累累的人，最需要人们爱的温暖。教育挽救这样的学生是教师的天职。在后进学生“闯了祸”，犯了错误和出现反复以后，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某种错误行为成为顽固的习性，要改掉决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教育他，就要耐心等待、诱导，更要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站在同情、爱护立场上的启发、诱导，较之简单生硬、咄咄逼人的教训、指责，往往具有一种扣人心弦的感化力量。我们不能采取印度影片《流浪者》中的工厂经理那种态度，把拉兹这些犯过错误的人一概拒之门外。试问，如果都把犯过错误的人拒之门外，那么叫他们往哪儿去呢？那样的做法，岂不是又叫他们去犯错误么？那样只能使他们灰心丧气，破罐子破摔，决不能把他们变好。我们应当做马卡连柯，伸出热情的双手，把一个个流浪者迎接进教养院，普照以爱的阳光，普降以教育的甘霖。

高尔基说过一句挺有意思的话：“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的事。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就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高尔基论青年》第6页）可见，这“爱”字里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呢！

让我们牢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卓越教育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教育论文集中的名言吧：“如果教师既爱他的

事业，又爱他的学生，那么他就是一个十分好的教师了。”

三 谈 育 才

人们盛传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为的是称颂那些善于识才的人。

人们乐道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其意无非是赞美那些敢于爱才，善于用才的人。

识才、爱才、用才固然十分重要，然而，欲求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育才岂不更是紧要？

故为此三谈。

孔子如何教人

常言道：妙手育良才。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良才济济，称得上是育才妙手了。那末，他这“妙手”是如何育才的呢？

《论语·先进》中所记载的一个实例，颇能说明问题。

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听到了一个道理，就照着去做吗？”孔子回答说：“你上有父兄，怎么一听到就自作主张去实行呢？”然而，学生冉求问了同一个问题，孔子却是这样回答：“听了立即照着去办。”这时候，有个叫公西华的学生感到纳闷，就问孔子：“为什么两个人问的同一个问题，你却作了两种不同的回答呢？”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平日缺乏决断，所以我就鼓励他前进；子路这个人向来

冒失莽撞，所以我要把他往后拉一下。”

这类例子在《论语》中还有不少记载。孔子在回答别人“问仁”、“问孝”、“问政”时，都是根据提问人的不同情况而作了不同的回答。

这是一种什么教育原则呢？

宋代大学问家朱熹把孔子这种教育原则称之为“各因其材”（《四书集注》）。“各因其材”就是因材施教么？孔子这位“妙手”，其“妙”就在于四个字：因材施教。

缝衣服要“量体裁衣”，种庄稼要“因地制宜”，培养人才就应当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

所谓“因材施教”，就是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个性差异进行不同的教育，或采取不同的措施，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用的人才。这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教育原则。它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学生个性的基础上的。《论语·先进》中记录了孔子对学生情况的分析：“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可见，孔子对他的每个学生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这就是他能够做到因材施教的前提。

由于孔子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他的门下就涌现出了大批既有广博知识又有各自专长的人才：德行出众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辞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季路；优于文学的，有子游、子夏，等等。可真是英才辈出，群星灿烂呵！

“神童”是怎么来的

古往今来，世上确有许多“神童”。

中唐大诗人白居易九岁已懂声韵，刚满十六岁就写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

宋代大诗人黄山谷七岁作牧童诗曰：“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明代著名诗人夏完淳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三岁作评论时政的《大哀赋》……

一九七七年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平均年龄才十四岁。其中不少人，例如江西的宁铂、湖南的谢彦波等等，也被人们誉为“神童”。

“神童”是客观存在的。值得探讨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神童”，其秘密何在。

《礼记·内则》篇上揭示了“神童”之所以成为“神童”的秘密。原来在古代，“子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白居易、黄山谷、夏完淳他们，才五、六岁时就有人教他们写诗作文了。宁铂从幼儿开始，奶奶、父母就给他讲故事，教他背诗词、识字，四岁时就学会了四百多字，五岁上学，六、七岁开始攻读医书，懂得一些中草药、脉象，八、九岁学习天文，十一岁能下围棋，讲《水浒》，具有丰富的知识。谢彦波从小在他父亲的辅导下，六岁半上学，小学三年级已学完初中数学，四年级向高中数理化进军，五年级已攻大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数学达到大学一年级水平。

可见，凡是“神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早期教育好有一比，宛如给种子催芽。春雨催芽芽早发。早期教育往往有助于早出人才。

相反，如果不给以教育，即使“神童”也会湮灭无闻。宋朝金溪地方不是出过一个叫方仲永的“神童”么？其人五岁时就颖慧聪达，能文会诗。令人惋惜的是，后来却落得个

了，“泯然众人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没有继续给以正确的教育了。鉴于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特地写了《伤仲永》一文，以为后人戒之也。

“差生”能否成才

这是一个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还是先来看看事实吧。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幼年在学校里，教师和同学都把他当作一个愚笨的孩子，常常欺侮他，嘲笑他，以致他不得不退学回家。可是，后来他却成了有一千三百多种发明创造的大科学家。再如牛顿（英国物理学家）、达尔文（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爱因斯坦（物理学家，生于德国，后迁居美国）等等，幼年也都平平。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举不胜举。小时候并没有崭露多少才华的人，后来却干了一番大事业，谁敢不承认他们是杰出的人才呢？

国外曾有人作过统计，在有作为的科学家、发明家中，小时候特别聪明的只占百分之五；反之，小时并非特别聪明的，却占百分之九十五。事实雄辩地说明，小时没有崭露什么出众的才华，并不能断定就是没有才能，将来不是人才。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先天素质在人的智力发展中的一定作用。如果否定先天素质对人的影响，也就是否定了儿童的个别差异。要是“白痴”，无论怎样培养也决不会有什么成就。但是，对一个正常的人，有健康头脑的人来说，先天素质只给人提供了身心发展的可能性和物质基础，它本身还不是知识、能力和品质，也不可能预定人的身心的发展水平。

一般说来，各人的天赋素质是差不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24页）对人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环境~~和教育~~。环境和教育塑造了人，所以历来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都极为重视这两方面对人的作用。就教育来说，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教师。加拿大里贾纳市有一所“择差录取”的中等学校——科克伦学校，从课程设置到教育方法，采取了一系列适当的措施，不是也把大批“差生”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了吗？

十七世纪著名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学教学》第十二章里写道：“我们差不多找不出一块晦暗的镜子晦暗到完全反映不出任何影象的程度，我们也差不多找不出一块粗糙的板子粗糙到完全不能刻上什么东西的地步。并且，假如镜子是被灰尘或斑点污损了，镜子便得先弄清洁；假如木板粗糙，木板便得先加琢磨；那时它们便将成为合用的人。”（转引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沙巴也娃主编的《教育史》第57—58页）他认为“一切儿童都可以造就成人”，关键在于教师是否具有慧眼和妙手。

说“严”三章

严而有格

我国自古有句谚语：“严师出高徒。”严师的特点，就是“严教”。

说到“严教”，有人就认为凡事都非板起脸孔不可。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严格，不同于严厉。严厉，动辄就板着脸孔训斥，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并不会带来良好的效果。我曾教过一个“乱班”。一开始，我就采取严厉管教。哪个学生在课堂里随便动一动，多说一句话，就要受到我的责备；有人听得有趣，发出笑声，我又要责备：“笑什么？！”谁害怕不敢作声，我更要叱斥：“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如此严厉管教，结果怎样呢？课堂纪律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乱说乱动的越来越多，甚至课外学着我的腔调，装着我的样子斥责同学的，也越来越多。可见事无大小，不讲方式方法，一律苛求与责备，“严”是“严”了，效果却适得其反。其原因就在于对孩子束缚过多，限制太死，只允许他们按照教师规定的轨道运行。鲁迅先生曾尖锐地指出这种教育方法的危害性：“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